# 马克思的两种历史进步观：封闭的与开放的

来源：网络 作者：琴心剑胆 更新时间：2024-06-08

*【摘 要 题】法国学者米歇尔·勒维在美国《社会主义和民主》杂志第14卷第1期（2024年春—夏季号）上发表文章《马克思的进步辩证法：封闭的或是开放的》，认为马克思有两种历史进步观，一种是目的论的、先定的和封闭的，一种是非目的论的、未定的和开...*

【摘 要 题】法国学者米歇尔·勒维在美国《社会主义和民主》杂志第14卷第1期（2024年春—夏季号）上发表文章《马克思的进步辩证法：封闭的或是开放的》，认为马克思有两种历史进步观，一种是目的论的、先定的和封闭的，一种是非目的论的、未定的和开放的。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 正 文 】

一、马克思的两种不同历史进步观

人们通常认为马克思是19世纪历史进步观的俘虏。这一指责是不准确的。马克思的进步观是辩证的，它既考虑到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消极方面，也完全有别于那种认为现代文明会导致社会生活逐渐且必然改善的观点。然而，马克思的这一辩证法是不完备的，而且也没有免于目的论因素。实际上，在马克思历史进步的辩证法中，存在着两种不同进步观的张力。

第一种进步观是黑格尔主义的、目的论的和封闭的。它表现了一种欧洲中心论的世界观。这种进步观认为，历史具有终极的、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目标，“历史事件”都是历史进步螺旋式上升中的某一时刻；而“理性的狡计”则能解释通向自由王国的不断运动中的每一事件（哪怕是最可怕的事件）。 在1853年另一篇文章《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里，马克思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观点：在印度，“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尽管“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但资产阶级和工业却“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同上，第772页），这个新世界就是社会主义。这篇文章的著名结论充分表现了第一种进步观的宏大和局限：“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同上，第773页）

马克思清楚地看到了资本主义进步的矛盾性质。他从未忽视资本主义的邪恶面，但他同样坚信资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对生产力的发展归根到底是具有历史进步性的（也就是说是有益的），因为它为“伟大的社会革命”准备了道路。

这种目的论的、欧洲中心论的论证，无疑为第二国际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教条提供了基础。这种决定论的社会主义观念认为，社会主义是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不断增长）发展不可避免的结果，这也使得某些具有马克思主义外观的理论将殖民和帝国主义扩张辩解成“进步的”成为可能。最后，它还能为斯大林主义的生产力论(stalinist productivism)利用。该理论将“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是工人对经济的民主控制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标准。

尽管这种“进步主义的”、决定论的和经济主义的方法可以在马克思的若干著作中找到基础，但是人们也能够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到另一种“进步辩证法”，这种进步辩证法是批判的、非目的论的，而且本质上是开放的。它认为历史同时既是进步又是灾难，既不会偏袒这一方也不会偏袒那一方，因为历史进程的结果不是先定的。弗里德里克·詹姆逊对《共产党宣言》的评论很好地表现了这种方法：“马克思强烈要求我们去做不可能的事，就是说，同时积极地和消极地思考资本主义发展；换句话说，就是在同一个思想中既理解资本主义明显的有害特性，又理解资本主义不同寻常的具有解放作用的活力，而同时两个判断的力度都不减轻。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使我们的思想作这样的理解：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上既是最好的事物，又是最坏的事物。” 在这个历史唯物主义批判性变体的框架里，与线性进步观相反，现代资产阶级文明与前资本主义社会相比，被看作既是进步又是倒退。“原始共产主义”时人类某些品质被建立在私有制和国家基础之上的文明摧毁了，而现代共产主义将恢复它们，这是贯穿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的一个主题。 在这个草稿中，马克思回到英国殖民问题：“至于东印度，除亨利·梅恩爵士之类的人以外的每一个人都知道，对土地公有制的压制是一种英国式的野蛮行径，这种行径没有使土著人民前进，而是使他们倒退。”（作者在这里注释说，这段话是从1881年3月马克思给查苏利奇回信草稿的一个法文版本翻译过来的，这个版本是作为1976年巴黎社会出版社出版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附录出现的，在马克思著作的英文版本中没有这段话。——编写者注）这一判断与他1853年的判断并不十分一致，那里重点强调殖民体系给资本主义现代化带来的社会进步方面。

这里的关键是历史进步的开放性问题。在开放性的历史进步里，历史进程的结果并非由不可逆转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这一向度预先决定的。正是这种开放性使得我们无法定义资本主义进步的最终性质：它是人类历史上“最坏的”还是“最好的”；是大灾难的前奏还是“伟大社会革命”的前奏。换句话说，应当将历史发展看作这样的进程：历史进程“充满了曲折和歧路，充满了分叉和交汇”。 &nbsp

&nbsp 马克思并不总以惟一方式对待历史进步问题。例如，在《资本论》中，他给出这样的表述：“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之否定。”类似的表述出现在不同时期的著作里。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写道：资产阶级“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同时他们也清楚地表明：“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如果将这一观点应用到今天的阶级斗争上，那就是说，社会主义革命并不是惟一的可能性：历史是开放的，历史结局并不由“生产方式的固有规律”预先决定。

丹尼尔·本萨义德(daniel bensaid)在评论这类文本时正确地认为，人们可以在马克思那里发现“自然科学模式（自然进程不可抗拒）影响和开放的历史辩证逻辑之间未解决的矛盾”。

二、后人对马克思进步观的发展

在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中，第一种进步理论，即决定论的和经济主义的进步理论，在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都占据了主导地位。即使如此，人们仍能发现，马克思主义中的“异端”流派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所暗示的“开放辩证法”。罗莎·卢森堡是第一个从《宣言》所提供的一般假说中直接推导出当代结论的人。她提出了“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是野蛮状态”的著名口号，认为历史进程中事件的偶然性因素是不可约简的，从而与一切决定论性质的目的论绝交——这就使一种最终承认“主观”因素的历史理论成为可能。被压迫者的意识，他们的革命组织，他们的政治主动性，不再如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自封为“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所说的那样：只对历史进程起到加速或者延缓的作用，历史进程的结果已经被“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预先决定了。

列宁和托洛茨基没有完全摆脱第二国际“进步论”和生产力论的深厚传统，但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他们发展了批判的辩证的进步观。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没有将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视为生产力发展的一个仁慈进程，相反，他认为这加强了其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最野蛮的统治，是更加血腥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基础。列宁已不把这个进程当作历史进步“不自觉的工具”。

而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巨大贡献则是否定了欧洲中心论，割断了生产力水平与革命时机成熟与否之间的机械关联，明确提出了社会革命运动非但不是直线前进的：封建社会—资产阶级革命—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生产力发展到生产关系再也不能包容的程度—社会革命，而是相反：社会革命运动倾向于在处于边缘的不太发达和现代程度不高的国家开始。

对进步观所作的马克思主义批评中最重要的无疑是瓦尔特·本雅明的著作。在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中，已完全清除了进步观念。对他来说，革命不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当然不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相反，他认为革命是灾难性“进步”的中断。用他的话来说，革命就像在炸弹（象征无法控制的技术）爆炸并葬送人类文明之前砍断导火索。 本雅明拒绝承认历史进步的观念，不管是“文明”意义上的或是“生产力”意义上的。他提出应当从历史受害者的角度，从遭受征服者的胜利战车碾压的阶级和民族的角度看待问题。从这一观点出发，进步对本雅明来说是邪恶的风暴，它将人类清扫出原来的天堂，使历史成为“一连串毁灭堆积起来的灾难”。革命不再是历史的火车头；它毋宁是人类在火车坠入深渊时的紧急刹车。

三、生态社会主义对马克思进步观的继承

马克思、罗莎·卢森堡和瓦尔特·本雅明丰富而具有洞见的直觉，长期为左派主流所忽视。左派主流一直陷于线性进步观和生产力论的意识形态而不能自拔。但是在最近25年里，我们终于开始看到生态社会主义继承发展了这些思想，对全球资本主义无限扩张所导致的生态灾难作出回应。马克思在新的语境中被重新解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也与生态社会主义者对生产力论的生态学批判结合在一起。 &nbsp

本文档由站牛网zhann.net收集整理，更多优质范文文档请移步zhann.net站内查找